

談鳳梁 著

古小說論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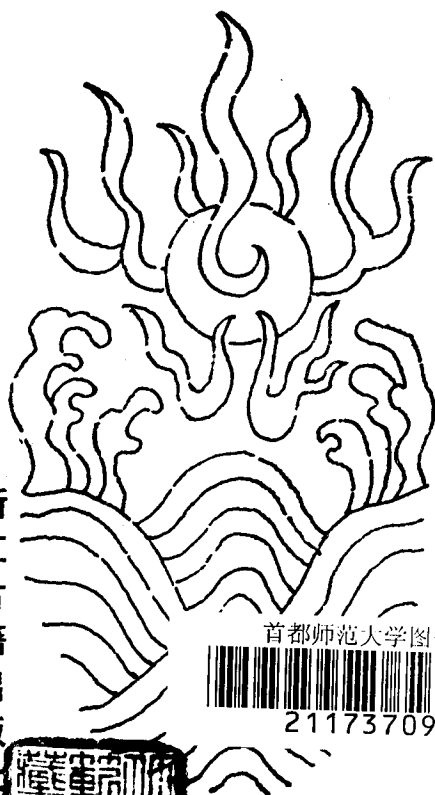
孫世題



谈凤梁 著

古小說論稿

孫老題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73709



浙江古籍出版社

1173709

责任编辑 吴战垒

封面设计 潘孝忠

封面题签 孙 望

古小说论稿

谈凤梁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41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 插页2 字数285000 印数1—7000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18-079-2/I·33 定 价：4.30元

序

DC39/18
南京是我很迷恋的地方。它离我的家乡太近了。大街小巷随时能听到熟悉的乡音，感受到温暖的乡情。在那里我结识了一批热情诚挚的同龄文友。每次出差，公务再忙，也得在南京师大教师宿舍的这家或那家，相互聚聚，欢愉地闲聊到深夜。

我认识谈凤梁同志不下十年了。他留给我的印象，永远是一张满带倦容的脸。我知道他的教学任务繁重，后来又当了校领导，行政上的杂事给他精神上带来什么本是可想而知的。这次读了他即将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古小说论稿》，我发现，长期的勤学勤写，也是他活得不轻松的一个重要原因。

他于一九五八年开始发表文章，写作兴致很广泛，小说、杂文、赏析……样样都试过（大多署笔名言炎等）。但我认为，他用心最多、成就最大的是关于中国古代小说考证、研究的那些文字。他完全有资格列入当代研究我国古代小说有造诣的中年学者之中。他的一些学术性论文得到一些前辈学者和不少同行专家的好评。他被聘请担任中外合办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编委和《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编委，一九八五年应美国佛罗里达大学邀请，作《〈红楼梦〉与中国古代小说》的专题报告，都说明了他的研究成果已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注视。

我国古代小说源流之长，内容之博大丰富，引逗了一代又一代学者浓厚的兴趣，有的为之奉献了毕生的心血，取得了卓著的

成果。自然这种成果更多是某一个方面的。仅就近代对名著《红楼梦》研究而言，有侧重考证的，如胡适、俞平伯、吴世昌、周汝昌、吴恩裕、冯其庸；有侧重观点阐述的，如何其芳、李希凡；有侧重艺术剖析的，如高语罕（他的《红楼梦宝藏》至今似乎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王昆仑、吴组缃、蒋和森。他们取得了突出成就，决不意味着后来者可以不继续大胆地研讨、补充或超出已有的成果。我说这番话的意思，并不是要把凤梁同志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上的成绩与公认的著名学者的成就相提并论，只是想说，凤梁同志在这块领域里踩着自己的足印在认真地开掘。学术研究，不象文学创作，一鸣惊人的事更加困难，能做到有点真切的体味和阐发，有点独到的艺术分析，有点资料的新鲜考证就很不容易了，就应该受到称赞。约二十八万言的《古小说论稿》，从上古小说谈到了晚清谴责小说，总体上看，作者力求将论点和材料相结合，其中也有较偏重观点的，也有较偏重材料考证的。从观点上看，他强调了几点：一、古小说被封建统治阶级看成“无害有益的帮闲”，“无所不包的杂拼”和“不足称道的雕虫小技”。二、从创作上看，古小说是由“纪实”发展为“虚构”的。三、从体制上看，古小说由笔记体到故事体，再发展为以描写人物为主的作品。以上观点，有些是别人谈过的，或零星谈过的，但作者结合对不同时期我国古小说具体的考察，将这些观点系统化，并加以较充分的论述，这就使这本《论稿》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此外，作者还从创作角度概括出古小说的一些特点：以虚构为主，题材和构思讲究“奇”，置情节于结构的中心位置，环境、情节和人物描写细致。这些见解，对当代小说创作的发展均有宝贵的借鉴意义。作者在考证上也有新的发现，如结合吴敬梓思想的发展（据作者年谱）论证，闲斋老人序为作者原作，再结合作品取材情况，论证《儒林外史》创作时间当为一七

三五年至一七五四年。又如，作者浏览了唐代的绝大多数笔记和历代小说评论，对“传奇”两字的考证，采用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材料，均严谨有序。

可以看得出，《论稿》里的文章是作者结合自己长期教学实践写出来的，它少有学究气，相信一般读者、学生、创作人员会爱读，并会获益的。如果从更高的研究要求来说，书中某些论点的论述还有待更深入，特别是对古小说的特点作规律性的概括时要更充分地考虑到其复杂性的一面。

浙江古籍出版社乐于出版这本论集，吴战垒同志又热情认真地做责编工作，这无疑是对作者的一个很大的鼓舞。作者若有时间，潜下心来，定会有更加出色的收获。预祝。

吴泰昌

一九八八年三月北京

目 录

序.....吴泰昌

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演变.....	1
唐代传奇小说的几个特点.....	29
唐代爱情小说的阶级局限与糟粕.....	62
简论唐代豪侠小说《红线》.....	75
宋元小说话本的艺术特色.....	87

《水浒》演变概况	108
《西游记》简说	119
浅谈《封神演义》的思想内容	126
吴敬梓和他的《儒林外史》	133
《儒林外史》创作时间、过程新探	154
《儒林外史》第五十六回当属原作	175
《红楼梦》“真事隐去”的艺术特点	200
《红楼梦》王瀛评本概述	233
《三侠五义》和侠义公案小说	255
《荡寇志》批判	265
晚清社会生活的生动剪影——简评“四大谴责小说”	284
简评两部古代小说史	292

阅读古代神话小说的几个问题	304
“风月宝鉴”怎样照——谈阅读古代爱情小说的问题	314
带刺的玫瑰——浅谈古代寓言的特点	319
艺术借鉴赘谈——古代小说札记之一	324
漫说题材的奇异性——古代小说札记之二	335
例谈典型人物的塑造——古代小说札记之三	339
千载声声骂“错斩”——《错斩崔宁》简析	345
《儒林外史》纪历	354

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演变

中国古代小说，是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土壤中萌发和成长的。它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从幼稚而日趋成熟，由简陋臻于完备。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既存在某些互不雷同的特点，又留下承上启下的鲜明痕迹。较之外国小说，它源远流长，有着明显的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探讨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发展和演变，有助于小说遗产的清理和研究工作，加深对于当代小说样式特点的理解，进一步批判民族虚无主义者在小说研究领域所散布的言论。这里，仅就古代小说概念演变中的三个侧面，谈一点粗浅看法。

一

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指出：古代劳动人民休息时“谈论故事，正就是小说的起源”。谈论什么故事呢？从流传至今的远古神话传说来看，大致有两类：其一是借助想象征服自然的故事，如“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等等。其二是蔑视统治权威的超现实故事，如“刑天与帝争神”、“共工怒触不周之山”等等。可见“小说”从它的起源之时开始，就是劳动人民进行生产斗争的一种武器，在阶级分化以后，又是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武器。

但是，“小说”这一名词概念的出现，却跟其起源时的属性有了差异。请看汉代以前的三条记载：

“饰小说以干县（悬）令，其于大达亦远矣。”①

“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②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巷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蕘狂夫之议也。……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③

这些记载，明白地告诉我们两点：一，在出现阶级以后，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专门设立了搜集、称说和记载“闾巷风俗”的“稗官”，从而把“小说”绑上统治阶级的战车，严重歪曲了“小说”的原意，抹煞和折损了民间故事的战斗光辉。事实上，当时的所谓“小说”，象《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所罗列的十五种书目，大都与民间故事南辕北辙。这些“小说”，虽然到隋代就已全部亡佚，但是从篇目和颜师古等人的注释来看，它们“收拾遗文，隐喻托讽”，“立意命名，动依圣哲”；或言黄老，或讲“养生”，或津津乐道于“治身理家”，喋喋不休乎医巫厌祝。其中《青史子》的有些篇章，甚至竭力宣扬“胎教”之类。由此证明，所谓搜集“街谈巷语”的说法，不过是一种幌子。诚如鲁迅所说，那时候的“小说”，“乃殊不似有采自民间，如《诗》之‘国风’者”④。二，统治阶级在歪曲和利用“小说”的同时，又加以轻视和贬低。他们把“小说”的作者，

① 《庄子·杂篇·外物》。

② 《昭明文选》卷三—江淹《李都尉》“袖中有短书”句李善注引桓谭《新论》。

③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

④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亦即“谈论故事”的劳动人民称作“小知者”，就连为他们“称说”所谓“闾巷风俗”的官吏也名之为“小官”^①。他们把“小说”的内容视作“小道”，用来跟鼓吹帝王之道和经国之业的“大达”相对举。他们无视民间故事的优美形式，仅仅根据“稗官”的称说和记载，就断言其为“丛残小语”和“小书”^②。他们左一个“小”，右一个“小”，从这里可见“小说”这一名词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它明显表现了统治阶级的利用和轻蔑态度。

正因为统治阶级利用和轻视“小说”，所以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小说”的概念出现了下列三层意思：

第一，无害有益的帮闲。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把经书史传当成“大道”，要求小说“佐经书史传之穷”^③，“补子史之所不详”^④。既然是充当“佐”、“补”的角色，自然无关大局，形同仆役；唯其略可济佐，不无小补，也就无害有益，毋庸废弃。那么，怎样“佐补”呢？就是要“不害于风化，不谬于圣贤，不戾于诗书经史”^⑤。从而配合经书史传，鼓吹封建统治思想。他们又认为，“小说”必须把“忠孝节义之训，寓于诙谐鬼怪之中”^⑥，用鄙俚通俗的形式，借助风俗传闻、遗事往还和神仙鬼

① 即“稗官”。《汉书》如淳注：“细米为稗，街谈巷说，其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颜师古注：“稗官，小官。”

② 据徐震堉先生考证，“短书”即“小书”。见《汉魏六朝小说选·前言》。

③ 引自无碍居士《警世通言序》。

④ 眷秋《小说杂评》，引自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

⑤ 引自无碍居士《警世通言序》。

⑥ 引自焦循《易余籀录》卷二〇“斥绝稗官小说”。

怪的故事来阐发或敷演经书史传的庄语说论。“翰君巧用齐谐体，衍出儒家语录来。”清代赵瓯北的这两句诗^①，集中表现了封建统治阶级把小说当成帮闲的真相。

第二，无所不包的杂拼。既然小说被看成“帮闲”，其题材、内容和形式就必定汗漫芜杂。在封建时代，一般文人学子都认为“博采旁搜，是亦古制”^②，“六经国史而外，凡著述皆小说也”^③。清代的刘廷玑曾经对历朝小说的内容作过一个概括。他说：小说“自汉、魏、晋、唐、宋、元、明以来，不下数百家，皆文辞典雅有纪，其各代之帝略、官制、朝政、宫帙，上而天文，下而舆土、人物、岁时、禽鱼、花卉、边塞、外国、释道、神鬼、仙妖、怪异……统曰历朝小说”^④。刘廷玑说了一大堆，其实只讲了笔记小说一支，而在笔记小说中，诸如考订、训诂、诗话、文谈等等，还并未罗列。由此可以想见古代小说内容冗杂繁琐的情况。就体制而言，古代小说也是包罗万象的。历代文人曾经为小说的分类工作煞费苦心。明代的胡应麟把小说分成六类：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和箴规^⑤。他的分类历来被不少小说研究者所引证和称道。但是，胡应麟自己对这种分类还并不满意，他曾经感慨：“最易混淆者小说也”。另外，他的分类显然着眼于小说的流派，并非专指体制而言。而且在体制方面，也没有反映全貌。象宋元讲唱话本、元明章回小说等等，他一概视而不见。当然，胡应麟所列举的六类，已经包括着类似于现代的应用文、议论文和记叙文等体裁，小说、故事、随笔、小

① 见金武祥《陶庐杂忆》。

② 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〇子部五十小说家类。

③ 引自可一居士《醒世恒言序》。

④ 《在园杂志》卷二。

⑤ 见《少室山房笔丛》二九“九流绪论”下。

品、叙事散文等文学样式的因素，足以使我们看到古代小说体制的纷繁情况。除此以外，从明代的蒋一葵开始，有些小说研究者还把弹词、戏曲等文艺样式冠上了“小说”的头衔^①。晚清的王无生，在其《中国历代小说史论》中，甚至把“戏曲之体”和“弹词之体”算作“小说”中的两种“体裁”。诚然，弹词和戏曲等等都是兴起于民间的俗文学，历来为封建统治阶级所不齿，原本与“帮闲”的概念不相一致，把它们划进“小说”范畴，多少对封建正统派的观点有所褻渎；但也说明，蒋一葵等对“小说”的概念仍然模糊不清，实际上还是接受了封建统治阶级对“小说”的看法，把它当作无所不包的杂拼。

第三，不足称道的雕虫小技。在封建时代，小说被看成文学的末流，遭到封建统治阶级的轻视和排斥。从历史的记载来看，自《汉书》而后，虽有不少史书把宋元以前的小说目录分别列入“艺文志”或者“经籍志”，但却被排斥于“可观者”之列，不能跟诗歌、散文等其他文学样式相提并论，更不得与炳彪堂皇的经书、史传等同日而语。至于宋元以后的白话通俗小说，绝大多数史官乃至编录“书志”的文人，避之犹恐不及，根本不肯给它们记下片言只语。偶有破例，则必定招致非议。象明代的王圻，仅仅在《续文献通考》中记下了《水浒传》等的目录，就遭到“罗列不伦”、“谬甚”等等的嘲讽和攻讦^②。再说小说创作，也一贯被视为雕虫小技。编撰小说的布衣文人纵然做出“成绩”，甚或得到某些统治者的赏识，也没有一个被写进了史书“文苑传”的。就连那些达官贵人“作意好奇”地写了点小说，也往往被骂

① 蒋一葵《尧山堂外记》：“杭州盲女，唱古今小说平话，谓之‘陶真’。”

② 参见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一六；查嗣琛《查浦辑闻》卷下。

作“浮薄轻佻”之徒^①。无怪清代的吴敬梓写了部《儒林外史》，连他的朋友程晋芳也为他惋惜，说是：“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小说）传！”^②更有甚者，在封建专制统治下，有时竟连阅读小说或者引证其故事，也要遭到斥骂，乃至闯下大祸。清圣祖玄烨，就曾经深恶痛绝地叫嚷：“乐观小说者，多不成材。”^③雍正年间的官僚郎坤，仅仅在皇帝面前引用了《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误用马谡”的故事，就被革职、枷号和鞭笞^④。上述种种情况，用近代一位小说研究者的话来概括，那就是：“昔之于小说也，博弈视之，俳优视之，甚且鸩毒视之，妖孽视之，言不齿于缙绅，名不列于四部……。”^⑤

列宁说：“每个民族的文化里面，都有一些哪怕是还不大发达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但也有……地主、神甫、资产阶级的文化。”^⑥中国古代小说及其研究领域颇有与此相类的情况。起源于民间的“小说”虽然被剥削阶级所利用和歪曲，但是，民间的谈论故事却并没有因此而灭绝。恰恰相反，它在与封建意识形态，其中包括帮闲小说的斗争中不断演进。当然，由于古代的奴隶和农民没有文化，所以他们所谈论的故事，很少记录并流传下来。但是，从与民间故事有着血缘关系的“说书”和“说话”技艺，“俳优小说”和“市人小说”等有关记载

① 例如，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一八“文人轻薄”条说：“唐士大夫多浮薄轻佻，所作小说，无非奇诡妖艳之事，任意编造，狂惑后辈。”

② 引自《勉行堂诗集》卷二“眷帆集”。

③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一二九，引自王传晓纂录《充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

④ 奕赓《佳梦轩丛著管见所及》。

⑤ 黄摩西《小说林》二题，引自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

⑥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

来看，民间“小说”的长河，始终没有淤塞和枯竭^①。如果说，民间“小说”在宋代以前，还未能脱颖而出，那么，从宋代以后，它就用“市人小说”这支激流，冲垮了封建的堤防，革创权舆，蔚为大观，使中国古代小说出现了一大变迁。

历来有不少古代小说的评论者，认为宋元前后，“小说之名虽同，而古今之别，则相去天渊。”事实也正是如此。从宋元话本小说，以及由此而发展的优秀短篇白话小说和长篇章回小说的情况来看，劳动人民对于小说概念的理解的确跟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观念针锋相对、泾渭分明。首先，以“小说”的主旨而言，它们违碍“随意劝惩，百端鼓舞”^②，“意主劝戒，有裨世教”^③的封建规范，竟至“上慢忠义”，“下诱强梁”，“专言怪力乱神”，“以杀人为好汉，以‘渔色’为风流”^④。例如，在宋元小说话本《京本通俗小说》的七个短篇中，除《菩萨蛮》和《西山一窟鬼》以外，《勘相公》抨击了封建统治者残酷压榨的罪行，《碾玉观音》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对市民阶层的压迫，《错斩崔宁》控诉了封建司法制度和吃人的礼教，《志诚张主管》批判了封建婚姻制度，《冯玉梅团圆》也还说了点官逼民反

① 这方面的材料很多，如《墨子·耕柱》曰：“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人民画报》1959年9月号介绍，1951年四川成都天回镇出土的汉代文物中，已有“扬枹拊鼓、神态活现”的说唱土俑。《三国志·魏志》卷二一《王粲传》裴松之注引《魏略》：“植（曹植）……诵俳优小说数千言……。”《太平广记》卷二四八引《荆楚录·侯白》：“（侯白）逢（杨）素子玄感，乃云：‘侯秀才，可以玄感说一个好话！’白被留连，不获已。”《酉阳杂俎》续集四“貶误”：“予太和末，因弟生封，观杂戏。有市人小说，呼鸛鵒作‘鸛鵒’字，上声。……”等等。

② 引自江东老嫗《醉醒石序》。

③ 见金武祥《陶庐杂忆》。

④ 引自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一七“正俗”等。

的道理：“官府只顾催征上供，顾不得民穷财尽……百姓既没有钱粮交纳，又被官府鞭笞逼勒，禁受不过，三三两两逃入山间，相聚为盗。”从这些小说话本的主题思想来看，劳动人民心目中的“小说”，不失为一种战斗的精神武器。唯其如此，宋元以后的不少小说，才遭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禁毁（唐以前的小说，未见有查禁之例）。象著名的《水浒传》，从明末崇祯以后，几乎历朝都被查禁。

其次，从作品的题材到形式，民间小说大都从实际出发，根据塑造艺术形象的需要，涉及到了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着极大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象宋元话本小说的题材，罗烨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中，就列举了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杆棒、神仙、妖术等八个方面。加上吴自牧《梦粱录》、耐得翁《都城纪胜》提到的“发迹变泰”和“说铁骑儿”，共计十个方面。它的形式，则既有长篇，又有短制，既有“平话”，又有“诗话”和“词话”。但是，丰富多样决不是兼收并蓄。它压根儿排除帝略、官制、考订、训诂等不足以构成文学形象的某些方面。在形式上，也绝然摒弃辨订和箴规等等，一味专注于人物故事的叙述和描写。可见，当时劳动人民心目中的“小说”，指的是叙说各种人物故事的文学作品。

第三，劳动人民和进步文人，十分喜爱和重视“小说”。当宋元时代的说书艺人在瓦子里讲唱话本小说的时候，市民们兴致勃勃，场场满座，而且“不以风雨寒暑，日日如是”。《水浒传》问世以后，竟至“茶坊酒肆，灯前月下，人人喜悦，个个爱听。”^①有些具有进步思想的封建文人，也竭力推崇小说。明代

① 引自俞万春《〈荡寇志〉引言》。

的李卓吾就把《水浒传》跟经书史籍相并列，称之为“至文”^①；袁宏道甚至认为：跟《水浒传》相比，则“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②这一切，恰恰又跟封建统治阶级的“雕虫小技论”形成鲜明的对照。

对于古代小说的概念，剥削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理解是不同的。但是，由于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思想，由于某些封建文人总要从充满生机的民间文艺中汲取养料，所以敌对阶级对于“小说”概念的理解，也存在着相互影响和彼此渗透的情况。例如，唐代以前，整个小说创作领域，几乎被封建统治阶级所垄断。他们的作品，内容大都纷纭杂乱，形式不外丛残小语。但是，由于某些封建文人自觉不自觉地搜集了民间的传闻故事，所以在他们的作品中，也出现了一些思想比较健康，形式注意完整的好作品。象干宝《搜神记》中的《干将莫邪》，颜之推《冤魂志》中的《弘氏》，王子年《拾遗记》中的《怨碑》等等就是如此。跟其他魏晋六朝小说相比，这些作品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忠君孝悌、仁爱礼义的封建信条，冲破了丛残小语、纷纭杂乱的程式。应该说，这种情况正是接受劳动人民对于“小说”的理解，不自觉地摒弃封建统治阶级的“小说”概念的一种表现。再如，在宋元时代的说书流派中，有一家名之为“小说”。因为这一家较之“讲史”，篇幅短小，形同“短书”和“小语”；内容又多记儿女私情和社会琐闻，并非叙说历代兴亡的“大事”。到了明代以后，则不管“讲史”话本还是“小说”话本，一起被称作“小说”。这又因为，一切“话本”较之经书史籍，都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也就统统可以囊括在“小道”、“小知者”的范畴

① 《童心说》。

② 《听朱生说〈水浒传〉》。